

# 絃絕而知變聲

《五峰山房詩集》編後記

劉居上

說起來，我與《五峰山房詩集》有緣。

鄭哲園是我母親的四叔，我從小稱他為四叔公。記憶中，自我懂事之日起，他就寄居我家，每天自顧自扒在書桌上抄寫，極少離開書房，連飯菜都得送到他的房間去，即使家裡再困難，也從不過問飯菜錢是從哪裡來的。相處多年，我對他始終陌生，祇知道，他年輕時曾是省港澳有名的才子。但那時，我正醉心現代文學，總覺得他那一套已經過時了，對他絲毫不存敬畏之心。

我還知道，他是位孝子。那時，他的母親仍然在世，與他同住一間臥室，那就是我的外太婆。太婆姓楊，九十多歲了，雙目失明，大半身癱瘓，飲食起居都由他照料。老人行動不便，祇能在床板上挖個洞，下面放馬桶承着，大小二便就從洞口解決，每天由四叔公負責清理。

四叔公有許多怪癖，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從不洗澡，即使六月酷暑，頂多用臉盆盛小半盆水，蘸條濕毛巾抹抹面龐和手臂。不知從哪年起，不僅不洗衣服了，甚至也不允許別人為他洗，直到把新衣穿成“鹹菜”。他出門時，倒是穿得整整齊齊，戴上禮帽，遠看頗有點紳士派頭。回家後換了便服，出門衣服一疊，又放回箱子。這樣的唐裝也分四季，而且各有多套，白的、黑的、雜色的，多年來，不斷輪換着穿。不知道是不是“修煉”有成，他似乎十分耐暑，別人汗流浹背時，他的身上、衣上永遠是乾乾的。

大概雖然“修煉”有成，卻還未到家罷，走近他身邊，依然可以嗅到一股怪味，加上房裡的癱瘓老人味，令人祇敢站得遠遠的喊話。房間永遠是那麼灰暗，甫進書房，已覺冷森森，更別說那氣味濃鬱的臥室了。所以，除非看望外太婆，我是決不肯進入他的房間的。



五峰山房 (20世紀30年代)

就像滴答的鐘擺那樣，日子在極有規律的千篇一律中度過，直到外太婆在上世紀50年代初以一百零二歲高齡逝世，直到他終於發現自己老了。於是，千篇一律的生活添加了一項程式，就是每天清晨對着鏡子一根一根地拔去昨晚新添的白髮。他是個大近視，偏又不戴眼鏡，照鏡時，祇好讓鼻尖不斷磨鏡，而後不厭其煩地把白髮一根根挑出來。

50年代末，我家房子被政府徵用了，為的是建工廠。於是，十多歲的我，第一次嘗到“被拆遷”的滋味。搬家後，房子當然比前小得多，四叔公生活沒着落，還得騰出一個房間給他作書房兼臥室。

1960年暑假，正在鄉村中學當代課教師的我回到家中，又見到了四叔公，七十過外的他大概自覺無法拔清新添的銀絲了，終於停止了這一程式，但精神看來似乎不錯，熬藥的砂鍋仍然與他無緣。某天早上(具體日期記不清了)發現情況異常，太陽昇得老高，他還沒有起床；拍門，呼喚，全無反應，推門而進，他已僵在床上。

母親是出嫁女，我是外侄孫，由我們主持喪事似乎有點不妥。於是想起他的“螟蛉子”——一位曾經口頭應承“過繼”於他的侄兒。

四叔公那一代人把“香火”看得極重，雖然十多年來一直由我們供養，卻始終把我們看成外人，一早就聲稱一切要由繼子承繼。雖則由始至終，即使逢年過節，“繼子”似乎並未想到身為繼子應該登門問候。

一經傳呼，“繼子”(為存厚道，姑隱其名)果然第一時間登門。第一舉動就是從遺體摸出鎖匙，裡裡外外搜索一遍，終於發現四叔公頭下枕着一個扁平的鐵匣。他不假思索立刻把鐵匣抽出，用鎖匙打開，把現金(他在生時，學生和朋友有時也會登門拜訪，通常都會送他一些茶資)和金石玉器取走，然後才找我們商量後事。他主張從簡，我們當即表示同意，因為那時確實沒有能力把喪事辦得風光，但決想不到喪事會辦得如此草率、寒儉，一副薄板就把他抬走了，連墓碑都是用一方紅色的地磚歪歪斜斜刻成的，墓碑上，“鄭哲園公”的“園”字竟刻成了“團”字！

“繼子”說，他是唯一繼承人，因此要把遺物全部搬走。這，我們也同意，不屬自己的東西

我們本來就不想要。過了一天，繼子從收購站先後帶來幾批收買破爛的人(中山人稱之為“收買佬”)，經過討價還價，一口價把他遺下的酸枝傢俱、櫥箱細軟全變賣了。半小時後，收破爛的帶來幾個人，開始實行大清理，把傢俱、櫥箱全部搬走，但對書櫃裡的線裝書，似乎卻看不上眼，或是講價時並不包括在內，總之祇是隨意往地上一倒，再也不看第二眼。

儘管我對四叔公並無感情，目睹這一幕，心裡仍不免酸酸的，很是難受。待傢俱、櫥箱隨搬運工離去後，我不由得細心打量起留在空蕩蕩房間中的那堆亂七八糟的書籍來。

一本灰色封面的手抄卷冊驀然撲入眼簾，撿起一看，其上用楷書工工整整地寫着書名——“五峰山房詩集”。不是生性狂妄，在那時，我對那位昔日的“大才子”，心中確實不以為然。但我至少知道，這薄薄一冊尚未付梓的詩稿，凝聚着他一生的心血，說甚麼也不能讓它給收購站搬走，悄無聲息地丟進造紙廠的化漿池裡。

我趕緊把《五峰山房詩集》拿回房間，接着，又從書堆撿出十多本手抄的醫書醫案，最後，乾脆把所有的字紙挑出，——這就是現在整理出來、附於書末的〈百花香〉。——全部拿回房裡藏好。書倒是一本沒拿，物既易主，不能讓他“繼子”發現已經動過！

時至今日，我還在後悔，當時怎麼就那麼老實，那麼迂腐呢？說不定那些殘殘缺缺的線裝書，其中就有珍貴的古版！而在當時，反復浮現於心的，其實祇有四個字：“問心無愧”。

又過一天，果然另有人上門，把書籍清走了。

最後一樣，是掛在牆上、寫着“愛妻楊幻辭遺像”字樣的炭畫。繼子把它取下，拆開，劃根火柴燒了，然後把酸枝鏡框帶走。

至此，不由得本人是否樂意，他似乎已經與這個世界徹底了斷。

詩稿和醫書在我那裡一擱二十多年，其間經歷過許多次驚天動地的政治運動，到文化大革命時，因為環境惡劣，我不得不忍痛把家裡的許多書籍和字紙變賣、燒掉了，他遺下的詩稿和醫書卻一直沒有動過，儘管我並不欣賞它。我祇知

道，它是四叔公一生僅餘的心血，不應該毀在我手上。而這，也是我今天整理、出版《五峰山房詩集》的主要原因。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寫詩、寫小說、寫散文，有時也寫舊體詩詞，說來抱歉，四叔公的遺稿祇是初檢時草草翻過一遍，然後就讓它一直靜靜地躺着。

進入80年代後，我的興趣漸漸轉移到學術和民俗方面，這才重把《五峰山房詩集》取出，開始認真閱讀起來。或許是年事漸長，閱事漸多，狂傲之心漸斂吧，我終於從他的詩裡品出味道，理解了他在抗日戰爭淪陷澳門時期的那份憤慨、無奈與辛酸，理解他對傳統詩詞的傳承苦心，理解他在詩藝方面的成就，在前後為他寫過幾篇推介文章後，終於決定全面整理他的現存遺作，這就是如今奉獻在讀者面前的〈《五峰山房詩集》釋文帶註〉。

儘管至今我仍不是鄭哲園的崇拜者，但我必須做好這一工作。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時至今日，除我以外，世上再沒有誰還保存着他如此之多的遺稿了。

## 鄭哲園生平

大約從抗戰勝利重回家鄉石岐並且開始杜門謝客之日起，“鄭哲園”這三個字逐漸淡出人們視野，到上世紀50年代，除了少數故人以外，人們實已忘記了“詩人鄭哲園”的存在。

這是他的不幸，同時也是他的大幸。不然，以他在舊政府任職的經歷，以及他孤傲、倔強的性格，很難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不惹上麻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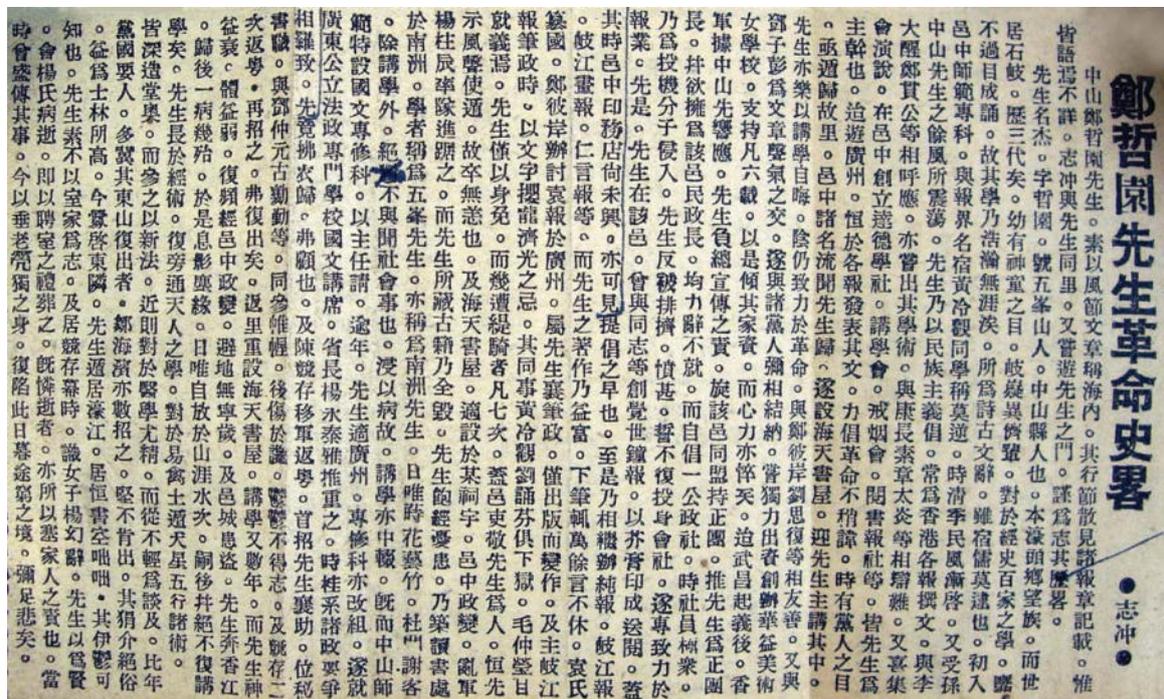
直到80年代末中山詩社編纂《中山詩詞選》，才有人記起，中山還有位晚清民初時期的著名詩人名叫鄭哲園。他到底還有沒有詩存世？其人的生平如何？至少，在詩社的編輯層面重又引起關注。

事實上，到那時，鄭哲園留給社會的印象已經十分模糊了。

我為詩社提供了基本資料，不過，當時我的所知其實不多。

新中國成立那年，我才八歲大，對這位業已蟄居多年的辭世老人，我能夠知道多少！

時至今日重翻資料，我才發現，新中國成立後國內出版的文史資料中，涉及鄭哲園的最早、



剪報一則，發表於1939年春

也是僅有的一篇，就是刊發於1988年1月，余菊庵執筆的〈鄭哲園邃於醫學〉，刊於《中山文史》第十四輯。

余菊庵比鄭哲園年輕二十多歲，因仰慕，每隔一到兩個月必登門探訪一次，凡來，必執晚輩之禮，一坐便是老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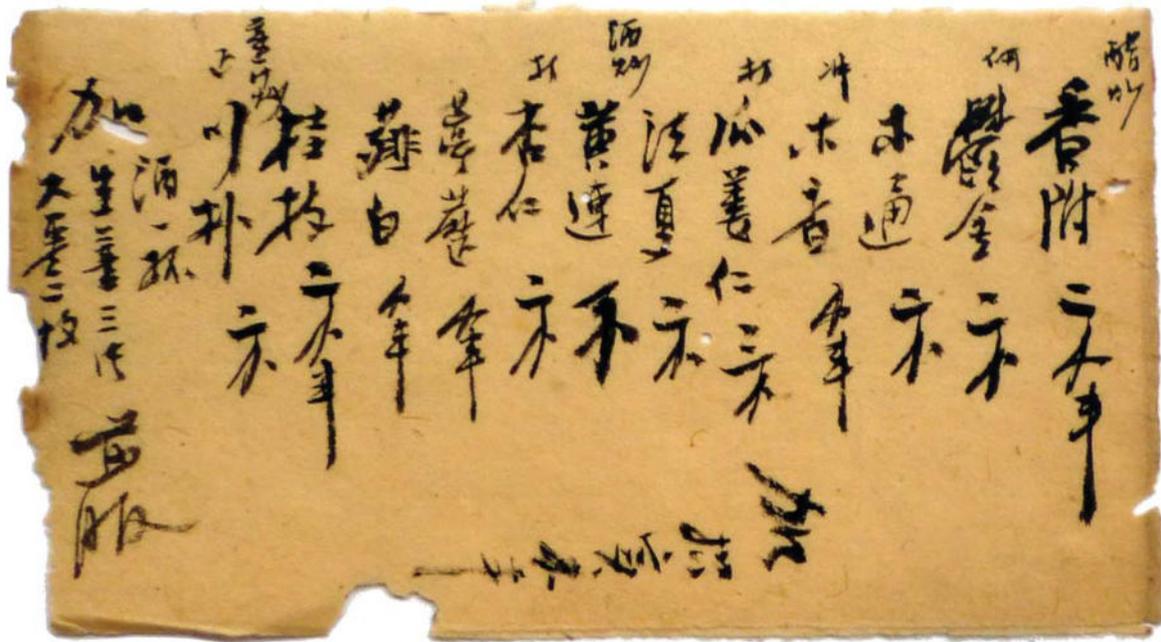
以余菊庵的年齡，以他與晚年鄭哲園的知交之深，他對鄭哲園的生平種種應該知道不少。但是，當時（文史資料不是即投即付印的，這篇文章，很可能已在政協的文檔中擱置多年）思想解放程度依然有限，因而行文十分謹慎，重點祇在醫學造詣，對他的生平，僅於開篇時略提幾句：

吾邑鄭哲園先生，工詩及駢散文。為人清介閒雅，不慕榮利。楊鐵夫長香山師範，聘為文史教師，又曾任仁言報社編撰。陳炯明主粵，慕其名，聘為從秘，不久辭歸。在石岐之南洲設海天書屋講學，四方來學甚眾。先生出其餘緒，造就人材不少。粵中學子，無不望風景慕。然其邃於醫學，則罕為人道。蓋先生晚年，蟄居馬龍舟巷〔按：余菊庵寫此文時，鄭哲園早已隨我家先遷治安街，再遷三帥坊了。余菊庵經常探訪鄭哲園，每一處他都到過，不

知何故仍寫最早的舊址？〕謝絕應酬，閉戶述作，不求人知，而世亦莫之知也。

大約與此同時，我在母親所收藏的畫冊中，發現一張夾於其間的剪報，標題是“鄭哲園先生革命史略”，作者署名“志沖”。現將全文轉錄如下：

中山鄭哲園先生，素以風節文章稱海內。其行節散見諸報章記載。惟皆語焉不詳。志沖與先生同里，又嘗遊先生之門，謹為其志其歷略：先生名杰，字哲園，號五峰山人，中山縣人也。本濠頭鄉望族，而世居石岐歷三代矣。幼有神童之目，岐嶷異儕輩。對於經史百家之學，靡不過目成誦，故其學乃浩瀚無涯矣。其為詩古文辭，雖宿儒莫逮也。初入邑中師範專科，與報界名宿黃冷觀同學稱莫逆。時清季民風漸啟，又受孫中山先生之餘風所震盪，先生乃以民族主義倡，常為香港各報撰文，與李大醒、鄭貫公等相呼應。又嘗出其學術，與康長素、章太炎等相辯難。又喜集會演說，在邑中創立達德學社、講學會、戒煙會、閱報書社等，皆先生為主幹也。迨遊廣州，恆於各報發表其文，力倡革命不稍諱，時有黨人之目。



夾於醫學筆記中的一張處方

亟遁歸故里，邑中諸名流聞先生歸，遂設海天書屋，迎先生講其中，先生亦樂以講學自晦，陰仍致力革命，與鄭彼岸、劉思復相友善，又與鄧子彭為文章聲氣之交。遂與諸黨人彌相結納。嘗獨力出資創辦華益美術女學校，支持凡六載，以是傾其家資，而心力亦瘁矣。迨武昌起義後，香軍據中山先回應。先生負總宣傳之責。旋該邑同盟持正團推先生為正團長，並欲擁為該邑民政長，均婉辭不就，而自倡一公政社，時社員極眾。乃為投機分子侵入，先生反被排擠。憤甚，誓不投身會社。遂專致力於報業。先是，先生在該邑曾與同志等創《覺世鐘報》，以芥膏印成送閱。蓋其時邑中印務尚未興，亦可見提倡之早也。至是相繼辦純報、岐江報、岐江畫報、仁言報等，而先生之著作乃益富，下筆輒為萬言不休。袁氏篡國，鄭彼岸辦討袁報於廣州，屬先生襄筆政，僅出版而亂作。及主岐江報筆政時，以文字擢龍濟光之忌，其同事黃冷觀、劉誦芬修飾下獄，毛仲瑩且就義焉。先生僅以身免，而幾遭緹騎者凡七次。蓋邑吏敬先生為人，但先示風聲使遁，故卒無恙也。及海天書屋適設某祠堂，邑中政變，亂軍楊柱辰率隊進駐之，而先生所藏古籍乃全毀。先生飽經憂患，乃築讀書處於南洲，學者稱為五峰先生，亦稱為南洲先生。日唯蒔花藝竹，杜門謝客，除講學外，絕不與聞社會事也。浸以病故，講學亦中綴，既而中山師範設國文專修課，以主任請。逾年，先生適廣州，專修科亦改組。遂就廣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國文講席，省長楊永泰雅推重之。時桂系諸政要爭相羅致，先生竟拂衣歸，弗顧也。及陳競存移軍返粵，首招先生襄助，位秘書職，與鄧仲元、古襄勤等同參帷幄。後傷於讒，鬱鬱不得志。及競存二次返粵，再招之，弗復出矣。遂返里重設海天書屋。講學又數年，而先生神益衰，體益弱。復經邑中政變，避地無寧歲。及邑城患盜，先生奔香江，歸後一病幾殆。於是息影塵緣，日唯自放於山涯水次。嗣後並絕不復講學矣。先生長於經術，復旁通天人之學，對於易禽土遁天星五行諸術，

皆深造堂奧，而參之以新法。近則對於醫學尤精，而從不輕為談及。比年黨國要人，多冀其東山復出，鄒海濱亦數招之，堅不肯出。其狷介絕俗，益為士林所高。今繫啟東鄰，先生遁居濠江，居恆書空拙拙，其伊郁可知也。先生素不以室家為志。及居競存幕時，識女子楊幻辭，先生以為賢。會楊氏病逝，即以聘室之禮葬之。既憐逝者，亦所以塞家人之責也。當時曾盛傳此事。今以垂老癯獨之身，復陷此日暮途窮之境，彌足悲矣。

我問母親，“志沖”是誰。母親回答，他是“海天書屋”的學生。

原來，志沖姓蕭，中山縣人，原名蕭志華，是鄭哲園最喜愛的學生之一，“志沖”這名字是他到香港當記者後，鄭哲園為他改的。志沖於香港淪陷前後潛回內地，後來成了某抗日部隊的團長，血染沙場。像這樣一位學生筆下的老師，應是大致可信的。

母親當年剪報時，根本就沒想到日後會被我引作論證的依據，所以剪報上並沒有注明日期，也沒有記下刊名。不過，根據文中的“遁居濠江”、“楊氏病逝”等語，以及文章發表於香港淪陷之前，基本上可以斷定，發表時間為1939年初。

根據志沖的文章、我從母親口中零星聽來的鄭哲園往事，以及我目睹他的晚年生活，現在可以較完整地對他的生平作一次綜合，並對志沖文補作必要的詮註與校正了——

鄭哲園，名傑，號五峰山人，又號南洲先生。（“五峰”是他老家濠頭的一處景觀；“南洲”則為他結廬講學之所。）出生於1887年，比他的同學黃冷觀大一歲。辛亥革命前夕，他剛二十出頭，就成為省港澳著名的詩人、報人與社會活動家。在學術方面可以在報刊上與大名鼎鼎的康有為、章太炎相詰難；他所寫的古文詩詞，令邑中宿儒自歎不如。作為孫中山先生的信徒和追隨者，他在邑中大聲疾呼，提倡“民族主義”（在當時，這是推翻清廷的同義語）。他所參與創立的達德學社、講學會、戒煙會、閱報書社等，無一不是以民間名義成立、對民眾進行思想啟蒙的團體。

這個時期的他，其實已成為他所出身的“望族”的叛逆者和浪子。幸而這一切得到他長兄鄭奕剛的支持。鄭彥聞，字奕剛，是清末民初年中山著名的報人和社會活動家，曾任香山縣參議和廣東省參議、廣東省新聞記者公會後補執委，曾創辦了迄今為止香邑辦報史上歷時最長（1915-1938年）的《仁言報》、中山第一家電影院——天外天影畫部、第一家游泳場——西洲游泳池。他還與弟弟鄭哲園一起支持他妻子杜慧劍創辦中山的第一家女子職業學校——華益女子職業學校（主要課程有語文、算術、刺繡、織布等，校址在孫文中路七星初地，創辦於1911年），以及中山的第一家幼稚園（原址在民生北路大蕭屋對面）。

他還曾於楊鐵夫（著名嶺南詞人）任中山師範校長時被聘為國文專修課主任；楊永泰主政廣東時，曾特聘他到廣州在中山大學、政法大學任教。直到桂系政要爭相找他，都想羅致他於門下，他感到不勝其煩，乾脆辭歸故里。

讀者可能注意到，關於華益女子職業學校，我的敘述與志沖是不盡相同的。依據主要是我母親鄭淡然的回憶，她是鄭彥聞、杜慧劍夫婦的長女，出生於1905年，華益開辦時已近二十歲，她所說的應該更符合事實。直到此時還是一介書生的鄭哲園，似乎確也欠缺開辦學校的經濟實力，但他為此出過大力，那卻是可能的。

據《中山市志》：“香山縣最早出版的報紙是《香山旬報》（創刊於光緒三十四年，即1908年），每旬一期，兩開四版，政治上擁護孫中山民主革命，但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總編兼發行人鄭彼岸”。市志顯然遺漏了比《香山旬報》更早開辦的《覺世鐘報》了。鄭哲園等人創辦的《覺世鐘報》，創刊於香山機器印刷業誕生以前，所以祇能沿用古老原始的石印，也正因為如此，發行量較少，祇能在小範圍內派發，最後連樣報也沒能保存留下來。至於由鄭哲園擔任主筆、創刊於1912年8月的《岐江畫報》，因為採用機器印刷，發行量相對較大，保存也較容易。因而至今尚有包括創刊號在內的多份《岐江畫報》保存於中山市檔案館。又按：志沖文中的《純報》即《香山純報》。

《香山旬報》於1911年易名“香山循報”，辛亥革命後再改名“香山新報”、“香山純報”，最後停刊於1914年。志沖在行文中以最後的報名稱之，那是可以理解的。鄭哲園在香山最早創辦的幾份報紙中均主“筆政”，其為香山報業前驅的地位已屬無疑。

《覺世鐘報》現已不可覓，但僅看刊名，即可知道它必定是一份頗為激進的刊物。

《岐江畫報》是一份“以圖畫濟文字之窮”的報紙，旬刊，主要是從本地新聞中摘出重要事件，配上手繪漫畫，然後於空白處再闡述與短評。例如創刊號上的漫畫〈放奴〉，畫的就是剪掉鞭子的革新人士引領大家把家中的奴僕送回鄉里。還有一張漫畫題為〈煙精苦〉，反映的是吸食鴉片的危害，整體精神與《覺世鐘報》是一脈相承的。

鄭哲園擔任主筆的報紙，還有他與他的學生黃居素共同創辦的《岐江報》。

影響最大的當然要數《仁言報》。該報歷史悠久，發行數量多，而且還是日報，至今忠市中山圖書館裡尚存有逐月裝釘的完整的《仁言報》舊檔。

《仁言報》是在1914年《香山純報》被龍濟光下令查禁後，為了填補輿論空缺，鄭彥聞、鄭哲園兄弟於翌年毅然創辦的。長期以來，《仁言報》在擁護共和、維護國權、反映民眾呼聲方面旗幟鮮明。這裡祇舉一個例子：

1923年10月25日，《仁言報》在紀念辛亥革命十二週年的“社評”中公開呼籲停止武人幹政。社論說：

有武人干政一天，就一天不能和平。有武人主持兵柄一天，就一天不能建設。中國革命成功已經十來年了，這十來年中，完全是武人干政。……治這病症之救劑：第一是改造政黨；第二是實際裁兵；第三是有政治學識的人們執政；第四是實行裁汰殃民的不法官吏。

很明顯，社論所指斥的“武人干政”，針對的就是背叛孫中山的陳炯明。鄭哲園曾是陳炯明的幕僚，《仁言報》刊出這樣的社論，足以表明，到此時，他已從思想上與陳炯明劃清界線了。

而在大約一年前，由當時已在陳炯明處當秘書的黃居素的舉薦，鄭哲園曾經意氣風發前往廣州，投到陳炯明（競存）幕下，陳炯明敬重他，讓他當了個空頭的“秘書長”。1922年6月陳炯明炮轟越秀山孫中山總統府時，鄭哲園和黃居素其實還在幕中。他倆雖不值陳之所為，但身為下屬，所能做的，也祇是居間調停，由活動能力更強的黃居素出面找吳稚暉，希望孫、陳重又修好。剛復自用的陳炯明拒絕調解，於是，鄭、黃二人憤而離開，轉而追隨孫中山。鄭哲園到底是詩人而不是政治家，離開陳炯明後，就不再與黃居素共同進退參與政治，而是掉頭折回老家中山，再當他的“南洲先生”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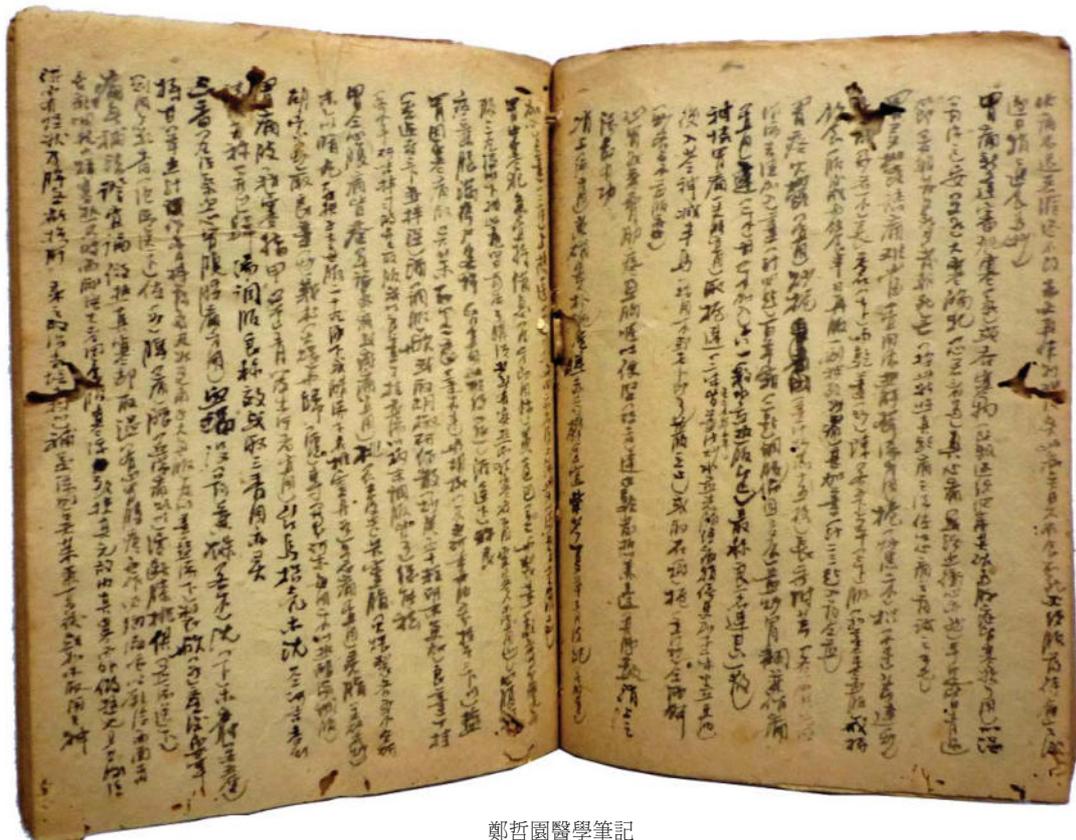
日寇侵華粉碎了鄭哲園的隱士夢。1938年春夏之交，眼見中山淪陷在即，鄭彥聞挈弟攜家匆匆逃難澳門。

志沖的敘述止於1939年初。其後部分，就由我根據母親口述和自己的印象補全。

從1938到1945年，鄭哲園在彈丸之地澳門一共蟄居七年。七年間，他所依附的兄長鄭彥聞，因為在經濟上進少出多，家庭人口眾多，昔日的中山殷商，終於淪落到如鄭哲園詩中所說的“七載經無芋可煨”的困蹙地步。鄭哲園親睹家國淪亡，飽嘗精神與肉體的煎熬，封筆已久的他，重又激起鬥志。在此期間，他與高劍父等人重組澳門清遊會，寫詩作畫，以文藝形式參與對日作戰，他最有價值的作品，大部分寫於這一時期。

1945年8月，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澳門市民擁上街頭放鞭炮慶祝。這其間，也包括了歲月蹉跎、年近六十的鄭哲園。是年秋，澳門書畫家在孔教中學舉辦展覽籌款賑災，他連夜送去詩作一首：

千株柳憶珠江月，十萬花開鏡海潮。  
如此河山如此夜，令人那得不魂銷！



鄭哲園醫學筆記

同年冬，鄭哲園回到久別的家鄉石岐。對意中人的永恆憶念，再次佔據了他的整個身心。志沖“及居競存幕時，識女子楊幻辭”的說法其實並不準確。楊幻辭是鄭哲園的表妹、母舅楊阜山的女兒，兩人原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孩子，鄭哲園出任陳炯明幕僚時，兩人終於訂下婚約。不幸的是，楊幻辭年紀輕輕就患上肺病，兩人遲遲不能成婚的原因在於此，中山淪陷前夕楊家滯留中山的原因也在於此。更難堪的是，鄭哲園離開家鄉不久，楊幻辭即於石岐遽爾逝世。然而，遲至同年秋天，鄭哲園才從逃難澳門的鄉親口中獲悉這一噩耗，想到因為自己的懦弱，不顧她的病而離開家鄉，致使臨終一面也無法見到，他不禁悲從中來，陷入深深的自責中。矢言日後不再婚配，甚至“不洗澡”以明志等極端行為由此而生。國難當前，他尚可勉強控制自己。等到抗戰勝利，繃緊的神經一旦鬆馳，難以言述的內疚與自責，不久就把他徹底壓垮了。

從那天起，直到逝世，誰也無法把眼前的衰朽老人與昔日風度翩翩的鄭哲園聯繫起來。他從此不寫詩，《五峰山房詩集》未定稿被塞下箱底，連封筆之作“千株柳憶珠江月”也沒來得及贖進詩集中。歲月留給他的，就只剩下如余菊庵文中所說的“遂於醫學”，“謝絕應酬”，“不求人知，而世亦莫之知也。”

### 晚年生活點滴

1938年是鄭哲園人生的一大轉捩點。

幾乎與1937年策動“七七”事變同時，為了佔領中國並進一步實現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日軍把魔爪悄然伸向華南海域。1938年初，日軍攻陷原屬中山的三灶島，並在那裡修建軍用機場，準備用作侵佔華南的跳板。形勢的險惡顯而易見。

幾乎與此同時，鄭哲園的同學好友黃冷觀病逝於香港中華中學校長任上。

黃冷觀（1888-1936年），清末秀才，曾在家鄉任煙洲學校校長，後加入同盟會。他是《香山旬報》的創辦人之一。1913年9月，由於中山報

界不斷撰寫、刊發聲討袁世凱文章，袁世凱的爪牙——廣東都督龍濟光終於下令查禁，首當其衝的就是《香山旬報》，主要撰稿人黃冷觀、劉誦芬等均遭逮捕，毛仲瑩慷慨陳詞，破口痛罵，不經審訊就被處決了。鄭哲園也因他主筆的《岐江報》言辭激烈，遭到先後七次搜捕。幸得在縣政府裡任職的學生示警，他才得以逃脫。

在將近三年的鐵窗生活中，黃冷觀日惟從事著述。直到袁敗龍逃，才於1916年3月獲釋。出獄後，他到香港任《大光報》主編，並為多家報紙撰寫社會評論。後來還創辦中華中學，自任校長。

黃冷觀逝世後，鄭哲園托人送去挽聯：

君豈以文傳，竟以文傳，為九天驚奏，為滄海龍吟，偏逢倭寇侵疆，肯於火坑宅中，更捱半刻？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是菩薩心腸，是英雄肝膽，莫憚修羅當道，且向鬼門關裡，再走一程。

撰聯時，他萬料不到，轉瞬間，自己也面臨要否逃離“火坑”的痛苦抉擇。他懷着依戀之情離開家鄉，同年秋，家鄉傳來未婚妻楊氏逝世的噩耗。雙重的打擊，終於嚴重扭曲了他的人生與性格。

但有一點，他是鐵了心不改的，那就是迂腐的書生習氣。

抗戰時期的澳門，米珠薪桂，日子過得十分艱難。據我母親鄭淡然回憶，那時，白米難買也買不起，平日裡吃的主要是玉米（廣東人稱之為粟米），家有老人、幼童，怕玉米吃了難消化，每天得花大量時間逐粒逐粒給蒸熟了的玉米除皮。

終有一天家裡幾乎斷炊。身為一家之主的鄭彥聞不得不忍痛出讓珍藏多年的一件宋代名瓷。買主已經找到，價錢也可以接受，但買主提出一個附加條件，就是請鄭哲園為他即將擁有的這件瓷器寫篇文章。

哥哥找來弟弟，告訴他有這麼回事，請他立刻動筆，為那件瓷器美言幾句。沒料到，鄭哲園斷然拒絕了，理由是“瓷器有價，文章無價，我豈是對商賈曲意逢迎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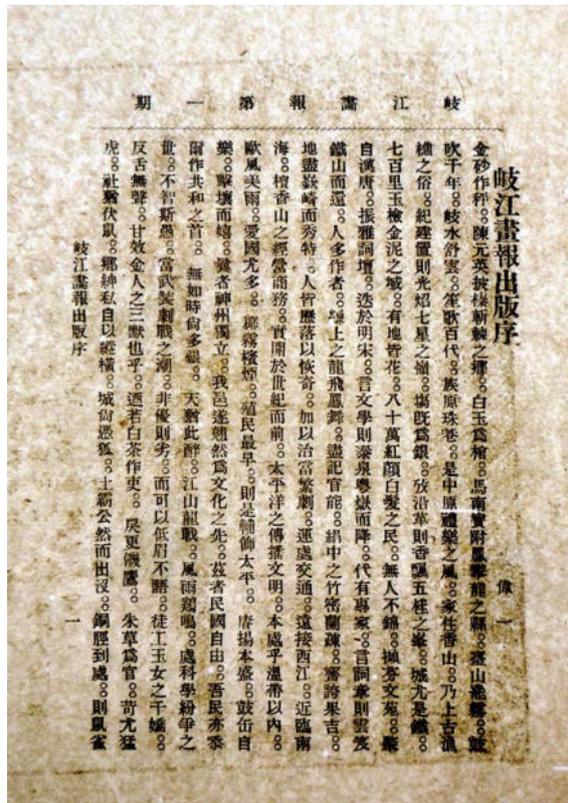


岐江畫報漫畫一幅

盜器賣不成，兄弟反目，見面如同陌路，時間竟達數月之久。

大抵上，鄭哲園居澳時期的處境，其實比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好不了多少，祇是他名氣大，還有一批家道殷實的朋友，因而看起來比孔乙己瀟灑、風光。不知道背景，僅讀他居澳時期的赴宴詩、唱和詩，是無法理解他心裡的矛盾與辛酸，那無可回避、無所不在但卻深藏於心的天人之戰的。

傳統的中國文人，大都以“六藝精通”自詡，鄭哲園也不例外。醫卜星相，琴棋書畫，他都有所涉獵，而且達到一定水準，有自己的獨立見解。這就是志沖所說的“先生長於經術，複旁通天人學，對於易禽土遁天星五行諸術，皆深造堂奧，而參之以新法。”在他那個圈子裡，他甚至以精通算術聞名，但大抵祇限於珠算和一般四則運算而已。我從小就是個數學迷，對母親告訴我的“四叔公數學極好”很不服氣，故意抄了道“韓信點兵”題刁難他：



岐江畫報創刊號一頁

“今有物不知其數：三三數之餘二，五五數之餘三，七七數之餘二，問物幾何？”（這道題問的是：有物品不知數目多少，若三個三個地數，最後剩兩個；如果五個五個地數，最後剩三個；如果七個七個地數，最後剩兩個；求這些物品一共有多少？）

半天過去了，他還算不出來。其實，我心中清楚得很，像這樣的題目，在西方是要用不定方程式解的，他沒有學過代數（現在的中學代數裡也沒有不定方程式的章節），當然解不出來；中國古代的《孫子算經》也載有解法，就是硬背歌訣“三人同行七十稀，五樹梅花廿一枝，七子團圓正半月，除百零五便得知”。經過一番相乘相加，再每次減去105，直到數目為105以下，那就是答案。至於為甚麼這麼做？書中沒有解釋，所以說它是典型的中國式傳道授業法。鄭哲園沒學過或者背不了《孫子算經》，自然解不出來。說這些，不是為了揭短，而是為了說明，在鄭哲園

及更早的年代，中國學問為甚麼如此神秘，就因為總是祇告訴你結果，卻不給你講解為甚麼。

上面摘引的志冲文，其實後面還有一句：“近則對於醫學尤精，而從不輕為談及。”大約他從“海天書屋”講學的年代開始，醫學就成了自修的日課。其動機，主要是為了從書中尋找方法，醫治楊氏的不治之症。肺結核在中國傳統醫學裡稱為“癆”，在鏈黴素、雷米封等西藥發明、推廣應用之前，中醫除了希冀患者增強體質以自愈外，別無他法。果然，未待鄭哲園找到新法，楊氏便遽然而逝了。經此挫折，惡補醫學就成了他人生的更高目標。相比之下，詩文倒在其次了。讀他的澳門詩，可以發現他題贈周貫明、吳肇鍾等醫生的詩特別多。無它，祇因為那時候彼此來往密切，最有共同語言。

光復後，研習醫學的念頭更切。除此以外，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了。老人醒來早，天濛濛亮起床，經過極其簡約的梳洗程式後，立刻轉入學習時間。具體說，就是趴在書桌上抄寫醫籍，或是記錄個人在閱讀後的體會心得。他用白紙裁成巴掌大小，裝釘成冊，幾乎整天不停地往冊上寫。眼睛越不行，字就寫得越小，因為，祇有那樣才能在往紙上嗅時，閱讀面大一些。字越寫越小，終於變成了一行行豎排的螞蟻。正常人不用放大鏡，簡直無法分辨。若疑心他從書出發又回到書中，豈不是紙上談兵，那就錯了。到後來，他的醫術，特別是醫學理論，真的達到了令專家佩服的水準。余菊庵的〈鄭哲園邃於醫學〉一文，就頗細緻地記錄下某些細節：

是時，予與摯友楊鼎新，合辦中英文補修班，租馬龍舟巷鄭屋為課室，與哲老比鄰。每課餘，輒過訪，見其用西山紙訂成小冊甚多，取其中一冊，用蠅頭細字，伏案疾書，滿一冊則換一新者，客至則擱筆掩卷，無所不談。以予尚非俗士，頗受歡迎。有時談及醫學，更滔滔不絕，持論特高，乃知所書之小冊，是錄其心得之見；蓋有志於名山之藏也。

所辦補修班不久，鼎新忽求退出，予驚走訪，見其精神頹喪，氣息微弱，淒然謂予曰：連日咳痰有血，得此不治之症，吾無意於人世矣（

當時癆症無特效藥）。予笑慰之曰：痰中有血，中氣乾燥，人常有之，反即靖壓診斷，勿徒自驚疑，予遂扶往劉渭川醫務所，請為其診檢。診畢，渭川曰：有肺病傾向，宜慎之。後私告予曰：其病已進入二期，恐非藥物所能奏效，予心愴然，預感失此良友也。後忽記起哲老，即告鼎新曰：今有一人，能愈君病，鼎新急問是誰？予曰鄭哲園。不料鼎新竟露輕鄙之色曰：吾亦久識此老，於醫學一無師承，二無臨床經驗，吾決不信其能醫病。予責之曰：汝何曾瞭解哲園，何猝下斷語？後經予力勸，姑且隨予往訪。哲老為其按脈察色，即曰：此病不難醫治，服藥數劑，便可無事，隨即擬方與之。果然，僅服兩三劑已見好轉，最後祇飲童便一小杯，不須服藥，身體亦完全復原。是時港方通知鼎新複職，婚後，旋赴美利堅。今春，鼎新飄然回到故鄉，乍見疑在夢中，清矍墨鑠，風趣猶初，予追憶四十年前事，猶歷歷在目。鼎新身感哲老再生之德，應亦未忘耳。

此外尚有一事，不可不紀。予長女年才六歲，右眼突現一點綠障，日漸擴大。予乃商諸哲老，承囑攜來一見。翌日攜女至，哲老詳為檢視，即曰：可以醫治。隨即擬方，另加麻雀糞一小撮，兔眼一對，研末載入小瓶，每晨用開水沖服一小杯。藥味極苦，女啼不肯服，予不忍強，妻卻手執藤鞭，逼令必服。每日如是，不覺瓶藥服盡，而目障亦愈。

哲老之醫學，誠不可思議。蓋其天資敏悟，以文學基礎，旁涉禪理，又以禪理進研醫學，故能融匯貫通，獨標創見。

“以文學基礎，旁涉禪理，又以禪理進研醫學，故能融匯貫通，獨標創見”一語，可謂玄之又玄，可圈可點。

若余菊庵所記無誤，則用中藥醫治肺結核的辦法，終於還是給鄭哲園找到了，雖則遲了十多年，沒來得及為楊氏診治。

據我所知，他與中山的幾位著名中醫都有來往，五十年代曾任縣人民醫院院長的余子修更是

他的莫逆之交，曾幾次勸他到醫院任職，但都讓他婉言謝絕了。

其實他還是有較多臨床機會的。親朋好友，遠近街坊，登門向他求醫的不少。每有患者求診，他必熱情款待，望聞問切後，就用一張窄窄的玉扣紙條寫下藥方，但決不肯收下那怕是一分錢的診金。

求診者越來越多，終至他極不耐煩。某日，他在書桌旁的牆上貼上一張貼子，上寫：

若有再為人處方者，烏龜王八蛋也！

然而患者還是一如往日那樣擁來，無論婉言或是嚴詞拒絕都請不走，於是，他祇得坐回書桌一一為之處方。偶從他的書房經過，望着他認真為患者把脈，再望望牆上“烏龜王八蛋”的字樣，我總忍不住掩嘴而笑。

直到搬家再搬家，他也日漸衰老，求診的人才逐漸稀少。

好些人對他的評價已近於“神醫”，不過，家裡人是從不找他診治的。原因是覺得縱是名醫，也難以平常心為親人診治；同時也多少有點信他不過。他開的處分很獨特，不僅外觀是狹長的一長條，而且其上密密麻麻的至少寫了二三十種藥名，份量特輕，每種通常祇有三兩錢，大約是普通醫生處方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我們的判斷是，他其實是沒有把握，所以把幾條藥方混在一起用，以求保險。當然他對此另有解釋，說是君臣輔助的需要。孰是孰非，恐怕可以列作當代中醫的研究課題，我這裡可說不準。

他其實還有另一種“日課”，就是在牘寫醫學筆記之餘排演金錢卦。五個銅錢裝進龜殼，搖過一陣後，倒出，一一排於桌上，然後掐指默算，並把卦象記於紙上，反復推敲，一個卦能算老半天。他算的甚麼呢？天曉得。晚年的他，已再無任何牽掛，甚至自身的休咎也不重要了，還有甚麼需要算計的？我猜想，對他而言，理論探討已重於實際應用。我曾草草翻過他留在小冊子上的筆記，除了病理藥方，並無關於星相學的記錄，不然真該好好研究一下。

## 詩與詩論

本文題目〈弦絕而知變聲〉是根據鄭哲園〈變聲〉詩的“抱琴欲奏弦弦絕，知道人間有變聲”二句摘編而成的。愚意以為，這正是解讀鄭哲園的詩和詩論的一把鎖匙。

鄭哲園成名很早，當他還是不滿二十歲的青年時，便名滿南粵，年紀比他大得多的人往往也請他為詩集作序寫跋。而在他自己心目中，卻是不大把“詩人”這頂桂冠當作一回事的。

青年時期的鄭哲園，可稱為他所屬的那個時代的“憤青”，政治抱負極大，你看志沖筆下的他：

時清季民風漸啟，又受孫中山先生之餘風所震盪，先生乃以民族主義倡，常為香港各報撰文，與李大醒、鄭貫公等相呼應。又嘗出其學術，與康長素、章太炎等相辯難。又喜集會演說，在邑中創立達德學社、講學會、戒煙會、閱報書社等，皆先生為主幹也。迨游廣州，恆於各報發表其文，力倡革命不稍諱，時有黨人之目。

在儒家思想薰陶下長大的中國文人，講究的是“立德、立言、立功”。鄭哲園擁護孫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主義，以推翻滿清封建王朝為己任，在邑中先後創立達德學社、講學會、戒煙會、閱報書社，是為立德；常為香港各報撰文，與李大醒、鄭貫公等相呼應，與康有為、章太炎等相辯難，是為立言；武昌起義爆發後，與林君復、鄭彼岸等合謀策動香山起義，並負宣傳總責，終於攻佔縣城，建立共和旗幟下的新政府，是為立功。在這十年間，說他是熱血男兒絕不過分。

儒家歷來把“經史”擺在“藝文”前頭。所謂“立言”，重在論文，然後才是詩，“詞”已是“詩餘”，即吟詠閒情逸致的雜藝，更不用說散曲、雜劇、小說之類通俗作品了。所以翻閱鄭哲園的作品集，竟見不到一首詞，不是不能，實是不屑為之。

鄭哲園於清末民初在香港發表的政論和學術文章我沒有讀過，不便多說。但他在家鄉開設的“海天書屋”，確是以文為重的。他對學生要求甚高，門下弟子都是青年甚至成年人，總數不過十多位而已，用的是因材施教的互動式教學法，根據各人專長選用教材，針對性很強。離開師門後，主要投身軍政界，其姓名、業績見諸地方史志者，就有兩位中山縣長（黃居素、鄭天健）和一位石岐鎮長（陳思危）。

在鄭哲園的學生中，最出色的要數黃居素。

黃居素（1897-1986年）是位頗富傳奇性的人物。他祖籍廣東梅縣。祖父於清同治年間遷居香山。九歲喪父，為維持生計，母親戴氏離家到大戶人家為傭，幼年黃居素就由祖父一手養大。雖然家貧，卻從小聰慧好學，僅讀兩個“半年”小學（即讀了半年後跳班，再讀半年）便跳班進入初中，一年後，因頑皮鬧事，被學校開除。回到小學，又讀了兩年，以候補第二名考入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就讀，但也祇讀了八個月，就因無錢繳交學費輟學。回香山後，改投鄭哲園門下。在他指點下，黃居素專心研習《史記》和《昭明文選》，打下扎實的文字根底。鄭哲園對他說，你可以辦報了。於是出資出力，支持他辦了兩年《岐江報》。黃居素不是那種可以安安份份靜下來做學問的人。1919年，他嫌中山天地太小，決意出外闖蕩。到廣州後，不知為甚麼，竟在光孝寺做起帶髮修行的和尚來。和尚生涯祇維持了半年，不過卻在那裡認識了已削髮為僧、法號弼元法師的中山籍民國元老林君復，經他介紹，認識了不少民國初期廣東軍政界要人。在他們介紹下，他跑到福建漳州，做起了陳炯明的書記，並於翌年（1920）10月隨粵軍回師廣東。這時，他想起恩師，於是由他力薦，陳炯明也把鄭哲園從石岐請來。1922年6月，陳炯明炮下令炮轟越秀山孫中山總統府。黃居素、鄭哲園不值陳之所為，但身為下屬，也不便多說甚麼。經商議，決定由黃居素出面找吳稚暉，希望孫、陳修好，剛復自用的陳炯明拒絕調解。於是，黃、鄭憤而離開陳炯明，鄭哲園自回香山，黃居素則轉投孫中山，1924年出任許崇智擔任粵軍總司令的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同年11

月，孫中山任命他為中央代理海外部部長。1925年出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同年，由廖仲愷推薦，出任中山縣縣長。1927年後，還先後擔任過南京國民政府農民部長、立法院首屆立法委員以及廣東省政府委員等職。

黃居素興趣廣泛，組織、活動能力強，與廖仲愷、鄧仲元關係良好，曾協助林森競選國民政府主席，又曾協助陳銘樞創建十九路軍。1927年至1928年間，還曾在上海隨黃賓虹學畫。

1932年，黃居素決心脫離政治生涯，轉赴香港定居、治學。新中國成立後，曾於1955年9月從香港回到北京，任職中央文史館館員，直至1957年返港。

因為身居要職，黃居素的知名度比老師大得多，不過，就詩論詩，他的《光網樓詩集》與老師相去甚遠。按他的天份和資質，鄭哲園本就不打算把他培養成詩人，這從他的主修書目為《史記》就可以知道。

文既無處可覓，這裡祇好談詩。

按《五峰山房詩集》（加上可以插入其間的〈百花香〉），鄭哲園的詩明顯分為兩個時期。其內容與風格的差異，簡直可與南唐後主李煜前期的“嚼碎紅茸，笑向檀郎唾”與後期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突變相比。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就遭際的落差而言，兩人其實是有若干相似之處的。

鄭哲園出身望族，年少才高，雖非大富大貴，兄長卻是知名士紳，套用今天的話，簡直可說是邑中的“傳媒大亨”和“文化產業”開拓者，通往社會的路早就為弟弟鋪設好了。鄭哲園既無衣食之慮、後顧之憂，加上一股年輕人的銳氣，大可睥睨一切，率性而行。所謂“雖宿儒莫逮”，或許祇不過是別人看在他哥哥面上讓他三分而已。

他這個時期的詩，雖說技巧圓熟（那年代學科單一，讀幾年私塾，便可寫出像樣的文字。以鄭哲園的學識和天份，寫幾首琅琅上口的詩當非難事），但也僅此而已，內容其實十分空泛、蒼白。李後主寫“嚼碎紅茸”，最低限度那時正在與小周后秘密熱戀，寫的是真情感。鄭哲園的“豔體”，卻是憑空臆想，文字遊戲而已，很難說有多大的文學價值。

他早年詩作中，最有價值的莫如描繪嶺南歷史、風情的竹枝詞。儘管他以文人品味擷取題材，大致還是寫實的，時至於今，讀來仍覺意趣盎然，栩栩如生。在從聯合國直到民間都在強烈呼籲保護、搶救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今天，它的存在尤顯價值。因為，他所描繪的場景，隨着歲月的流逝，泰半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讀者大約留意到，在《五峰山房詩集》卷首，赫然出現一組以八國聯軍侵華為題材的〈示警〉，詩是愛國詩，但卻無須給予過高評價。明眼人一眼可以看出，置於卷首，無非是刻意安排，旨在申明自己從小便以“家國”為重。既如此，其後發生那麼多重大事件，怎麼不見反映？

真令他思想震動的，其實是在接觸孫中山與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實即倡建共和）學說以後。從志沖的述說可知，從那時起，“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公子哥兒突然長大了，就像春蠶破繭似地，整個兒脫胎換骨。他在集會裡登臺發表演說，不知疲倦地奔走於平民百姓當中，辦學社、辦戒煙會、辦閱報書社，儼然成了民主革命的急先鋒。

所有這些，都應該得到充分肯定。問題是，到那時，他已經不寫詩了。《五峰山房詩集》輯至1905年，加上〈百花香〉，充其量也祇延至1914年。〈百花香〉的寫作跨越九個年頭，總數卻祇有二十五首，對一位素以詩鳴的人說來，那也未免太少了。這就足以說明，在那個年代，“以文載道”的傳統確實深入人心，詩寫寫可以，但到親身參與社會變革，要明白宣示自己的主張時，詩就顯得搔不着癢處了。所以，從1905年起，鄭哲園便已少詩，甚至無詩，原因祇有一個，他真的不想寫了。

青年時期的鄭哲園不是以詩、而是以行動來證明自己的。回想那場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在香港，那就是香山起義），可以說，那時候，詩人鄭哲園以他的整個身心，寫出他一生最為瑰麗壯麗的詩。

1938年春，在三灶失陷，日軍隨時可能向華南大舉進犯的戰爭陰霾籠罩下，鄭哲園倉皇逃離中山，舍棄了經營十載的海天書屋，舍棄了心愛的書籍和古物，甚至離開了正患重病的未婚妻，心中的抑憤與無奈可想而知。鬱結的痛苦需要發

洩，“窮居無告以詩鳴”，除了寫詩以外，他再也找不到別的表達方式了。

在澳門，他寫下的第一首詩，首句就是“一夜星霜鬢已斑”（《至澳門作》）！他覺得，自己已經深陷到伍子胥過昭關那樣的窘境了。五十年來一直把命運緊握在自己手中的他，哪承受得了這一巨變？儘管澳門原屬香山縣治，即使後來被葡人強佔了，兩地仍然有着千絲萬縷的經濟、人文的聯繫，他從少年時代開始，就以座上賓的身份不止一次造訪澳門，然而，“昔供憑弔今揮淚”，反差實在太大了。

到澳門沒幾天，他已像受傷小鳥那樣哀叫：“謝客竟無門可閉”、“嗟來有食已難期”……其實，以鄭家的殷實，即使作客澳門，總不致於一開始就淪落至此。問題祇在於，到這個時刻，他的自負仍然絲毫未減，總覺得社會虧欠了他：“過江有客成枯鯽，橫海何人識臥龍。亂世文章還有價，半生肝膽向誰鍾？”（《旅次逢名畫家高劍父》）實際上，也祇有在如此強烈的衝激下，從小深受傳統詩教薰陶，奉“溫柔敦厚”為正宗的他，才有可能因為“抱琴欲奏弦弦絕”而“知道人間有變聲”（《變聲》），詩風由是大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值得後世緬懷、研究的詩人鄭哲園，到這一天才真正登上歷史舞臺。

無意對他的詩一一評論，因為，這已經是另一個課題。我祇想指出：直到此刻，作為詩人的鄭哲園才真正長大了，成熟了。在此後的詩中，我們逐漸從他身上看到晚年杜甫的影子：橫空出世，突兀奇崛，句式多變，用字運典，已到了得心應手的地步。

詩人是需要群體的，沒有群體，也就“嚶鳴”不起來。戰時的澳門，流寓於此的內地文人並不缺乏，很快地，他就與高劍父、張逸等昔日的廣州清遊會詩友一一相遇，因為“嚶鳴”的需要，更因為祇有集結成群，才能為抗日救亡發揮出應有的光和熱。於是，由他們牽頭，流寓澳門的清游會員重新結社，這就是戰時的澳門清遊會。他們和澳門本土的詩人、畫家，如黃沛功、王愷岸、賴鎮東等來往密切，相互合作，從而使澳門進入空前活躍的“戰時文化”時期，對此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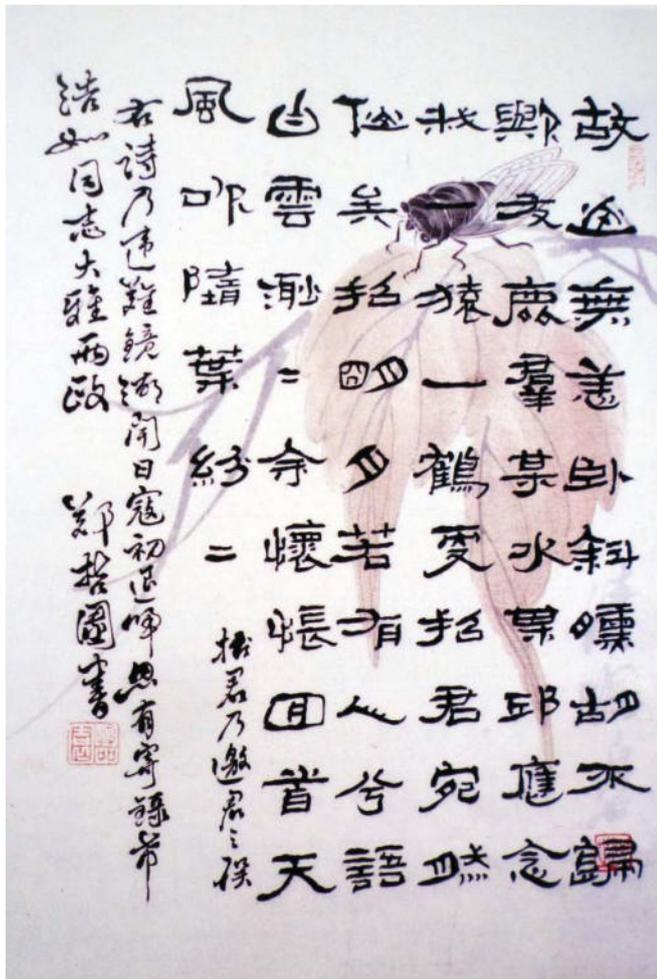
澳門社會文化素質的整體提高作出了重大貢獻。

戰時澳門的國際環境異常複雜。澳葡當局雖然利用日本在南美留下眾多日裔的弱點，迫使日本同意澳門“中立”，許多事情卻不得不屈從於日軍的淫威之下。看似波濤不驚，其實岌岌可危，米珠薪桂，並非真正的樂土。寄居於這一隅的有頭有臉的“南渡衣冠”，並不都是胸懷浩然之氣的。其間，有臨敵作“輕颯脫”的逃命將軍（《客中》），也有“亡家破國誇能達”的醉生夢死的苟安者（《所見》）。凡此種種，鄭哲園均於詩中給予辛辣的痛擊。

流寓澳門的內地知識分子當中，也有人對抗戰前途持悲觀態度，因而萬念皆灰的。鄭哲園的鄉親李孝頤就曾勸他把詩稿付之一炬了事。對此，鄭哲園不僅寫詩“慰之”（《李君孝頤將詩稿焚去談者惋惜慰之以詩》），還鄭重申明自己的詩稿不能燒的原因：“勞者自歌勞者聽，天聲人語此文章。”（《友或勸余焚稿未能也，示以此作》）他說的是：我的詩是寫給後世作為史料看的。甚麼叫“天聲人語”？那就是替天行道，為民鼓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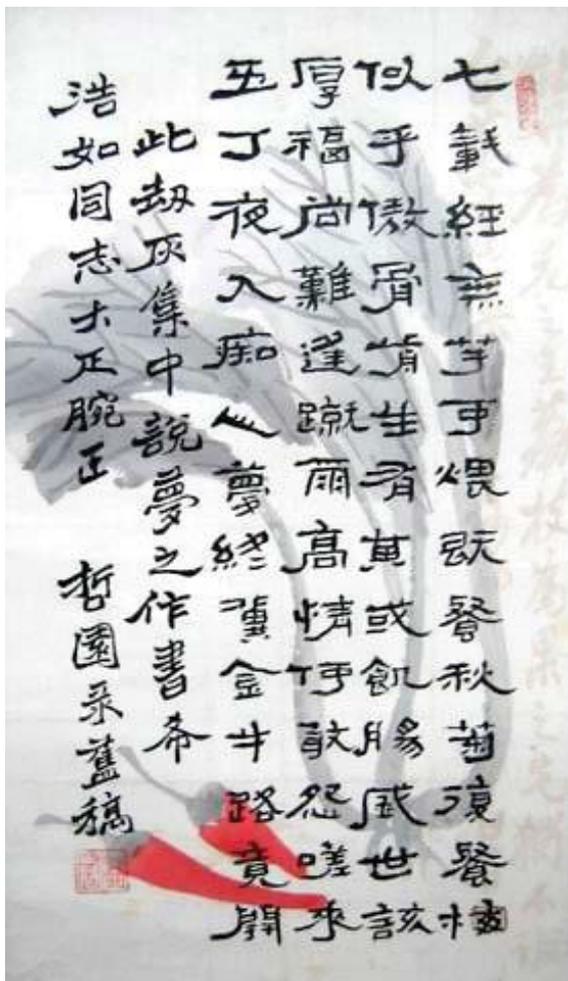
通過詩，我們仿佛見到，昔日的“憤青”戴着一頭白髮回來了。他“膽粗粗”仿效女媧“煉石補天”，企盼“五丁開路”的重光之日（《說夢》）。見到高劍父新作《火照旌旗夜受降圖》，他不假思索補上“聞擊每在畫中思，談笑雄心見之。一夜受降城上飲，江山重見漢旌旗”。此詩大約寫於1942年，那時，中國抗戰剛剛進入最艱苦的時期，詩人的遐思，卻穿越了無邊的黑暗，看到黎明前的曙光。

在鄭哲園的澳門詩中，有一組特別值得重視，那就是他為以高劍父為首的春睡諸子寫下的贈詩。這是迄今為止最早也是唯一的、以詩的形式評價春睡諸子的組詩，不僅描繪他們的丰采，分析他們的書畫源流與風格特點，甚至還頗有遠見地馳想了他們此後應有的成就。



鄭哲園所書贈郭浩如詩

居澳七年，鄭哲園與春睡同仁一直保持密切接觸與良好的關係，常到“普濟禪院訪春睡諸君劇談”，為他們舉辦的抗戰畫展捧場，還興致勃勃地為他們的新作題詩。他讚揚高劍父“萬里風光奔畫腕，一天星斗繞吟胸。”（《題高劍父先生游喜馬拉雅山紀念詩冊》）、“誰將禪味畫中探，十二緣觀萬物函。”（《觀名畫家劍父先生生老病死圖慨然有作》）；司徒奇“栩栩如生從腕出，真真欲活得心傳”（《贈畫家司徒奇》）；何磊“拈花自幻心中境，插草聊參畫裡禪”（《贈畫家何侶已》）；關山月“畫為心境最分明”、“人太孤高品太清”（《贈畫家關山月》）；伍佩瑩“粉本紛披筆意酣”、“作品獨



鄭哲園詩箋贈郭浩如

饒馨逸賞”（《贈女畫家伍佩瑩》）；李撫虹“詩中有畫王摩詰，筆下如刀漢史遷”（《贈畫家李撫虹》）；黃霞川“竟化龍飛能法古，驟驚驄失直通仙”（《贈畫家黃霞川》）。他還為熱情款待春睡諸子的慧因上人寫詩贊曰：“趣絕人稱哈大師，能書能畫亦能詩。祇因圓字能參透，勝卻三千妙偈持。”（《贈慧因上人》）

我曾把組詩帶給身在澳門的嶺南畫史家陳繼春博士看，陳繼春讀後，不禁拍案驚呼：“竟有如斯的預見性，早在40年代便已預見他們此後各自的發展路向和藝術成就了！”讀者不妨細讀春睡諸子的傳略和各自的畫冊，以驗證陳繼春的話說得是否有道理。

令我稍感意外的倒是，鄭哲園竟漏題了一位當時也在澳門的春睡弟子，那就是我的母親鄭淡然。

鄭淡然（1905-1997年），中山石岐人。乳名淑淑，小字秋雲。七歲隨梁雲樵學畫，隨叔父鄭哲園習詩填詞。三年後師事李鹿門、李君彝父子。李鹿門出於番禺居廉門下，曾東渡日本學畫，與高劍父是同輩的師兄弟。1924年，她獨闖廣州，成為高劍父門下弟子，素有“花王”美譽，與伍佩瑩、張坤儀並稱為“嶺南畫壇三女傑”。抗戰期間隨家流寓澳門，勝利後重回中山，新中國成立後被聘為廣東省文史館館員。晚年曾應邀赴澳門及廣州嶺南美術紀念館舉辦畫展，主要著作有《鄭淡然畫集》。

春睡畫院是高劍父於1924年1月在廣州創辦的，同年，鄭淡然即已加盟畫院，算得上絕大多數春睡弟子的師姐。在澳門，她有自己的家，用不着與同仁們一起擠住普濟禪院，但還是參與他們的畫事活動的。我曾查閱1939年“春睡畫院留澳同人畫展”場刊，目錄中就有她的畫作。我還在她的遺物中找到澳門西灣的速寫稿，證明她是參加了高劍父一行的西灣寫生、創作活動的。鄭哲園的春睡同仁組詩，恰就寫在“春睡畫院留澳同人畫展”期間。在鄭哲園參觀畫展後，幾乎每位春睡同仁都獲贈詩一首，何以偏偏缺了她？其實，贈詩雖是根據對各人及其畫作的印象寫成，基本上持客觀、公正的態度，但畢竟是贈詩，美言幾句是免不了的。這類話，對朋友但說無妨，對晚輩就很難說得出口了，而這，正是他躊躇再三終於沒有動筆的緣故。

僅憑這組詩，嶺南畫史就應為鄭哲園獨辟一頁。

我還想談談他詩觀的演變。

大凡詩歌愛好者，祇要遇上合適場合，總喜歡以種種方式闡明自己的主張。在鄭哲園撰寫於早年的《百花香》裡，果然就有兩篇為他人撰寫的跋，裡面談了不少關於詩的見解。但僅存的這兩篇跋，讀後難免令人失望。儘管文字寫得花梢，讀起來像繞口令，其間並沒有新穎的獨立見解。

流寓澳門後，詩風的陡變反映了他對傳統詩觀的懷疑與挑戰。終於，在《五峰山房詩集》的澳門詩中，我們讀到了三首論詩的詩：

#### 讀詩示諸任

萬法歸無法，要惟義與辭。  
有心常落跡，無意始工詩。  
甯效古人拙，毋為習俗移。  
神行夫豈敢，虛白是吾師。

#### 友或勸余焚稿未能也示以此作

昔余詩法薄中唐，今則俳優與賤娼。  
僂辱有生仍罵座，郎當何處不開場。  
或邀後世哀吾志，縱起尼山恕我狂。  
勞者自歌勞者聽，天聲人語此文章。

#### 某君問余詩事以此答

文章猶鄙事，大道在希夷。  
此調非常調，餘詩不是詩。  
可為知己道，難免俗人疑。  
試看鳶飛處，天空任所之。

上述三詩，主要闡明了三點：

一、詩雖是末事，卻不能以常理衡量。說某詩“大氣”，那是因為詩人寫詩時心有所託，所以一出手就不平凡；至於那些言之無物的，根本就不是詩。

二、詩怎麼寫，不是憑主觀意願就可以決定的。昔日，我連中唐的詩也嫌格調不高，現在怎麼連罵娘的話也說得出口？那是時勢逼的。為了讓後世記住這段慘痛的歷史，詩的寫法不能不變，那就叫“變聲”。若有人不願接受，我會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我這是寫給國破家亡的百姓們看的，說的是他們心中的話，難道這也不行？

三、甚麼叫“詩法”？就是把別人告訴你的這種“法”那種“法”全部忘掉，自己悟出最合適的寫法來。不同詩有不同寫法，這就叫“詩無定法”。寫詩不能從俗，不能跟着潮流走，不能一開始就存炫奇鬥巧之心。刻意總是要留下痕跡的，祇有從心裡流淌出來的才是好詩。寫詩的訣

竅在哪裡？一句話，就是必須留下“空白”，讀者讀後浮想聯翩，自會覺得意趣無窮了。

我的演繹，或許已經過頭。閱讀本就是再創作的過程，要是不能從中有所感悟，還有甚麼閱讀價值？這也正是鄭哲園所說的“虛白是吾師”的奧妙所在。

鄭哲園旅澳期間所寫的詩論，正是在反思後對自己前期創作的一種不着痕跡的否定。他旗幟鮮明地申明，詩可以有變體，詩應該反映現實生活，應該為讀者留下聯想的空間。——這就是他為中國傳統詩論發展所作的貢獻。

## 結語

幾年前，在一篇紀念文章中，我把鄭哲園稱為“最後的隱者”。

話雖說得武斷，但我相信，在他以後，再難有人“隱”得如此徹底了。

鄭哲園現象是特定歷史年代產生的特殊個案。

現代人為謀生計，或者由於政治因素，總是不得不違心地說一些自己本不想說的話，做一些自己本不想做的事。你想離開塵世遠遠，塵世卻來干預你的生活。哪能像他那樣，自返回中山後，整整十五年時間，就像泡沫似地突然消失在空氣中呢？——儘管他其實活得好好的，偶爾還會出現在人前。

不管他有多麼大的缺點，不管他晚年是如何的怪癖，他確實做過不少有益於社會的事，留下了一批出色的詩作。體現於他身上的那種異乎常人的堅持與忍耐，更不是隨便哪一個人可以做到的。

我想，基於以上事實，無論誰都不能不承認他實在是一個相當優秀的人。一位優秀詩人，活在人間卻早已乾癟成影子，難道不是亙古未有的悲劇？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隱者多矣。伯夷、叔齊遁世是因為恥食周粟，陶淵明遁世是因為不肯為五斗米折腰，可鄭哲園的“隱”，你能說是為甚麼嗎？

連可以說服自己的理由也找不到！

這就是鄭哲園莫以名狀之悲劇的可悲之處！

(2010年4月)